



在现场

听夏弘宁谈上海蔬菜供应

文 / 葛昆元

今年3月末,读了《新民晚报》转载的《菜篮子里看民生》一文,感触颇深,不禁想起了几年前仙逝的夏弘宁先生。

夏弘宁先生是著名文化名人夏丏尊先生的孙子。他除在上海金融系统工作外,还曾多年从事上海蔬菜的组织供应工作,历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亲身经历了上海蔬菜供应从极度紧张到随到随买的繁荣景象。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下午,夏老给我讲述了上海蔬菜供应的往事。

一开始夏老就说,700多年前上海已是一座港口城市。城市里种不出蔬菜,市民吃菜必须去购买农民或小贩挑运进城的蔬菜、禽蛋和其他副食品。鸦片战争后,上海商业发展,人口猛增,随之产生了蔬菜地货行(即早期的蔬菜批发行),不久还办起了菜市场。地货行作为菜农与菜贩中间的批发商,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由于利润可观,蔬菜地货行逐步被一批流氓、菜霸所把持。直到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蔬菜批发还完全由这些地货行控制。他们既向菜农收取成交额的10%,又向菜贩收取4%的高额佣金;菜少时还抬高价格,市民叫苦不迭,菜多时则向农民杀价,菜贱伤农。对此,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迫使私营地货行降低佣金;随后又加快对私营地货行的改造,成立上海市蔬菜公司,将蔬菜供应全面纳入计划管理,保证每天向每一位上海市民供应5两蔬菜。如此,存在了100多年的蔬菜地货行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应当承认,为了实行上海蔬菜的计划供应,国家和上海有关部门是做出了不少努力的。”夏老说,比如,1958年为了解决上海蔬菜和主副食品的供应,中央将江苏省的松江、宝山、嘉定、川沙等10个县划归上海市,使菜田面积扩大一倍多,并规定专业菜田必须常年种菜,不得插种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还严格规定专业菜田生产的蔬菜,菜农不能私卖私分,更不能拿到集市卖高价,必须全部进入国营蔬菜批发市场,统一分配市场,上海市民则凭卡买菜。

“但是,”夏老接着说道,“当时的蔬菜生产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再好的计划,也可能变成‘滑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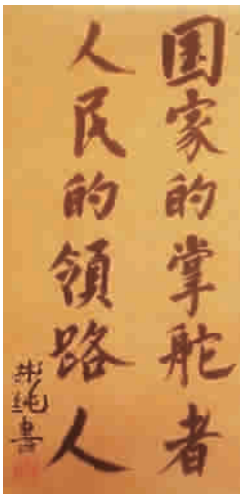
的确如此,计划供应的头三年,上海蔬菜供应情况比较稳定。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开始出现排队争购蔬菜的现象。1959年初上海每人每天只能供应2两蔬菜。市民们为了多买点菜,起早排好几个队,还常常引发争吵,秩序混乱。这种情况一度还引起全国上下朝野关心。夏老说,当时叶圣陶老先生在与他的通信中,常常问到上海市民吃菜困难缓解了吗?国家也全力支持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首航就是开赴天津、青岛装运近万吨大白菜,驰援上海。但是,这些依然不能真正解决上海市民的吃菜问题。后来,上面竟然指令菜田改种粮食,种蔬菜则片面追求数量,造成蔬菜品种单调,淡旺季矛盾扩大,供应大起大落,不仅市民买菜更难,而且还浪费严重。虽然从1974年到1991年国家为

上海市民吃菜拿出7.4亿元财政补贴,但市民依然抱怨说:“买菜难,难于上青天!”

“说老实话,我们蔬菜公司的同事,包括各菜场营业员都是起早贪黑努力工作,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满足不了市民的买菜需求。”夏老十分苦恼地说。怎么办呢?“有句话说得好,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夏老说,市民买菜难的问题,逼着他们去改革。

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菜篮子工程”实施之后,上海蔬菜产销逐步向市场经济迈进。蔬菜公司先在十六铺试办贸易货栈(次年改为蔬菜副食品交易市场),实行开放式经营。“人不分公私,货不分南北”,均可在此自由交易。很快上海市郊也办起多家交易市场,各地进入上海的非计划蔬菜已占到三分之一左右;2006年仅江桥蔬菜副食品市场经营的蔬菜就达到165万吨,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上海全年上市量。与此同时,重新开放集贸市场,不久集贸市场的蔬菜年经营量也占到总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之后,随着科学种田为广大市郊菜农所接受,淡旺季蔬菜供应更趋平衡。当联华、华联、农工商、家乐福、麦德龙等超市纷纷经销蔬菜时,市民们确实已跨入了随到随买的新时代,那种“买菜难,难于上青天”的尴尬局面,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临别,夏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世间万物都是沿着一定的内在规律前进的。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城市的蔬菜供应,概莫能外。



书法

王彬纯(七十岁)作



老有所乐

2017年9月下旬,我随冯小龙、谢柏芳所率的中山熊猫慢垒教工队、社会队赴昆山参加“2017中国慢垒全球健康赢大赛”,分获教工组冠军、社会组亚军的优异成绩,高兴之余,我又收获了一份惊喜:我在球场上意外地遇见40年前教过的上海队员!

我出生于1925年,家父梁扶初(1892-1968)系旅日华侨,组建华人棒球队,打败过多支日本队,以证明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他愤然举家回沪定居,执教棒球。因此我从小就打棒球,并与多位同伴在“孤岛”正式注册了“熊猫棒垒球队”,打败过多支外国球队,成为中国棒球劲旅(上海《新民报》晚刊1948年报道,称我是“中国最优秀棒球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我一直是“熊猫”、“上海”棒垒球队的主力、队长及教练。

1977年,百废待兴,我义务到五十九中学执教棒垒球。当时,我任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手,但每天坚持早晨、下午骑自行车去中学2次,教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打球。由于教学相长,1979年五十九中学队就荣获上海市中学生冠军,同年代表上海赴延边参加全国中学生棒垒球大赛,结果也获冠军!当时我就向上海发了“全胜冠军”4个字的电报(至今仍珍藏这份电报)。我本人和队员都受到各地球队的“热捧”,让我投手王心泉作了示范。

若干年后,学生毕业就各奔东西了,而我也随子女定居美国,这样双方就“失散”30多年。我一生志在让中国棒球走向世界前列,十多年来无数次回国义务培训青少年,并在祖籍地中山组建、执教“熊猫队”,涌现出很多优秀球员。为此,2014年中国棒垒球协会授予我最高奖项“终身成就奖”。

话说去年9月下旬,正当我在昆山球场上观战时,十多位50多岁的球员一下子涌到我的身边,原来他们是当年五十九中学的队员,真是一场奇遇,我激动万分!我们重叙了30多年的分别之情。我获悉,他们都事业有成,从2012年开始重聚,每周六练球,并特意将自己的这支业余球队命名为“梦五十九”,参加各项比赛……他们既锻炼了自己的身体,又继续着同窗的友谊。

看到他们的茁壮成长,我很欣慰,说明我与钟燕青、郭华乐等老师当年的付出都值得。

今后,我会经常回沪,与“梦五十九”队员多多欢聚,因为这会让我忘掉自己的年龄,我喜欢活在这样的“梦”里……

喜遇「梦五十九」

文 / 梁友文

孙子给我当「校对」

文 / 姚国勇



隔代亲

每天下午快4点的时候,老伴就将上小学5年级的孙子从学校接了回来。

回到家,孙子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写老师当天布置的家庭作业,而是给我当“校对”——做我发稿前最后把关者。在这之前,我已经将打好的文章放在电脑的桌面上。孙子每次校对时都很仔细认真,看完一遍后,又接着看第二遍;有时,我一句话重复打了两遍,孙子发现后,立马喊我看看,随后就将多出来的一句话予以删除。至于我写的错别字,孙子也都揪了出来,例如既然的既,我写成了即。这些都没有逃过孙子敏锐的目光。孙子在班上语文课代表,老师经常向班上学生推荐他的作文,进行课堂点评。这多少对孙子在写作方面是一个激励。市报社上个月成立了小记者团,孙子被所在学校选送,成了一名小记者,而且作文还见了报。

孙子给我当“校对”,让我很放心。有的文章发表后,我拿样报给孙子看。他很聪明,能够发现编辑老师的修改之处,并指给我看。做爷爷的,我从心里眼里喜欢这孩子,并准备多投一些资金,好好培养他。



忆往昔

机床厂的俱乐部

文 / 刘翔

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上海机床厂的俱乐部是最令我流连忘返的“景点”。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其底楼凸出的门廊和那三扇半圆形的门厅,加上奶白色的外墙面,颇有点西洋建筑的特点。这种设计风格究竟是巴洛克还是洛可可,我也搞不清楚,反正我觉得这是一幢在机床厂所有的建筑中,最漂亮、最洋气的大楼。俱乐部的一楼是图书馆、阅览室、电视放映室,二楼是乒乓室、棋牌室,三楼是会议室等。俱乐部,顾名思义,就是供职工娱乐休闲的地方。但对机床厂的职工子弟来说,俱乐部也是我们的一座乐园。每到星期六,我就会想方设法溜进机床厂,随后直奔俱乐部,走进寂静的阅览室,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可是,随着“文革”的爆发,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图书馆也就停止对外开放了。没有书读,对正处在求知欲旺盛期的我而言,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怎么办?一个偶然的机,我从图书管理员阿姨口中得知,那些下架的“封资修”毒草图书,都被封存存在俱乐部大厅内的柜子里。这时,一个大胆的“贼心”在我心里滋生:去偷出来看看。孔乙己不是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吗:“窃书不能算偷”。这话虽没道理,但还是有点歪理的哩!

嘿嘿!贼心已定,就等下手了。可我偏偏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人,始终不

敢动手。直到我把消息透露给一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在他的鼓励之下,我们才决定“狼狈为奸”去窃书。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俩翻过军工路靠近佳木斯路一侧的机床厂围墙后,躲过夜巡的警卫,神色慌张地来到了俱乐部门口。庆幸的是,俱乐部的大门只是虚掩着,否则我俩要破窗而入了。由于事先早已踩过点,因此,轻轻推开大门后,我俩在黑暗中熟门熟路来到封存“毒草”图书的柜子边,猛力拉开锁着的柜门,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几本书籍朝书包里一放,就慌不择路地逃出俱乐部。

回到家里,躲在被窝中把书包打开一看,哇,好激动啊!有《红旗飘飘》《苦菜花》《青春之歌》《建国以来优秀散文选》等。这一晚,我翻阅着这几本“毒草”书,一直读到东方既白。其中《建国以来优秀散文选》一书中的杨朔《荔枝蜜》、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脍炙人口的散文,至今令我回味无穷。可见,“中毒”何其之深。虽然,那几本书看完后,我又悄悄地潜伏回俱乐部,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书又物归原处了。但几十年过去了,我平生的唯一一次“作案”,让我恐惧了一生,从此不敢再有一丝贼念。

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俱乐部被拆除了,原址建起了厂部办公大楼。父亲保存的一张他和胸戴大红花的先进工作者一起在俱乐部前的合影照,也就成了我珍藏的历史照片。